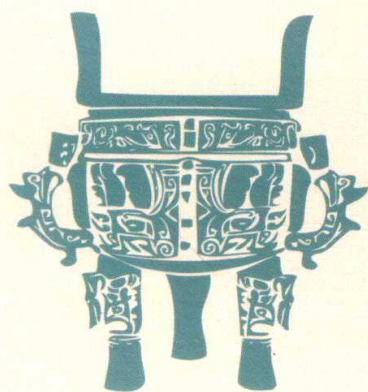


# 历史的风景

重返历史上  
200个关键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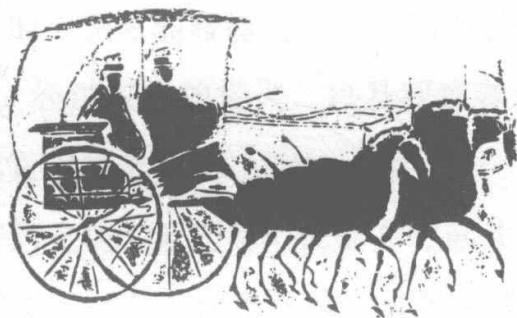
黄西蒙 著



# 历史的风景

重返历史上  
28个关键瞬间

黄西蒙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历史的风景：重返历史上28个关键瞬间 / 黄西蒙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008-7321-1

I. ①历…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研究 IV.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280052号

## 历史的风景：重返历史上28个关键瞬间

---

- 出版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姚 宁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印制管理中心)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7千字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印制管理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 从思想史到心灵史

喜欢观察历史的人或许可以被称作思考者，在时间的维度上思考历史，独立个体的渺小与整体历史叙事的宏大会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具体到个人的情感上，所谓“历史”不过是认知世界的一个渠道。当岁月的片断一点点打开，浮现在观察者面前的，未必是一个逻辑严谨的历史叙事，而身处一段历史之中，就更加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历史、热爱历史的国度，古往今来从不匮乏记载与观察历史的人。似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思维上建构了一套历史的叙述，但当不同思维的火花激烈碰撞之后，一闪而过的灵光却往往成为“主流”之外的异数。经过权力的规训，以及观察者话语权的建构，一套“主流”的历史线索就稳定下来。

被叙述的历史与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很多时候并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但当前者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下来，即使谬误也可能变成事实，而曾经的真相可能深埋地下，永远不见阳光，除非后世产生的偶发因素让被压抑的真相重现天日。



但以更大的时间尺度看，被这两种“历史”囊括的人物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毕竟被记录下来，而更多或者说绝大多数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的人物、发生过的事件，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然而，没有被记录下来，不等于他们的人生是乏善可陈的，那些湮没在尘埃下的故事，可能有着比史书上更加震撼人心的情节，有着太多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有着太多独属于那个时代无法被后世理解的精神旨趣。

如果没有司马迁留下的《史记》，先秦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多数可能就要变成传说。而事实上，《史记》对西周之前的记述，也几乎成了孤证，被后世反复质疑，直到甲骨文惊世出土后，才逐渐让人触摸到一点上古史的真相。但即便伟大如太史公，他的观察与记述依然不是复刻式的，其中的因素，不只是众所周知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在于历史的信息随着时光逐渐消失，太史公最熟悉的历史只能是距离他最近的秦汉，这对更古老的文明而言，是一种无法消弭的不公平。

当然，用所谓的“上帝视角”来看待司马迁，对他也是不公平的，司马迁的历史观当然离不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他已经竭尽全力，为后世描绘了一幅中华早期文明的图景。司马迁思考秦汉易代的历史时，其实就是在观察他们的“近代史”，他当然不知道自己身后还有几千年的精彩故事，就像他只能用追溯古人的视角来看待五帝与夏商，因为那就是司马迁心中的上古史，能把帝王世系和几件大事记录下来，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那些化为烟尘的上古史并非没有意义，只是很少有人关心它们。人们总是对离自己近的历史更敏感，对与自己有关的故事感兴趣，但越是晚近的历史，反而有可能在各种被利益裹挟的话语里变得含混不清，扑朔迷离之间，并非历史本身的问题，而是被操纵的历史叙述所致。



就像司马迁会反复琢磨刘邦与项羽争雄的问题，但一个生活在商朝太戊时期的农民是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可能就不会被关注到。这个普通的商朝农民，未必没有可歌可泣的故事，但还是被后世统归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式的单调人生。当然，这个小人物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他可能终其一生都没能看到新商王的诞生，因为太戊在位时间之长足够囊括多数人一生的长度。

历史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传承与断裂后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残酷。历史长河中的跌宕起伏，既是理性与秩序的重启和毁灭，也是情感与思想的衍生和流变。我一直在想，如何才能让那些被掩盖的人物“复活”过来，尽可能真实地表达他们内心所思所想，由此来观察历史现场的状况。这可能不只需要史料的支持，也需要情感的介入，是“理解之同情”而不是“开脑洞”，是谨慎的揣摩而不是任性的臧否。

如今，有两种极端的观察视角颇为流行，一种是把各种宏大叙事与“上帝视角”囊括在历史人物身上，好像他们的言行与后世叙述的历史逻辑是一样的，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走进教科书的，最后成为冷冰冰的历史概念。还有一种视角，是所谓“庸俗人性论”的泛化，好像一切历史人物都是深谙厚黑之术的，每个人都只是为利益而争斗，最后沦为各种鸡汤书籍的经典案例。真实的历史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单调的，不同视角的历史折射出不同的人性，其中不乏那些被高悬于空的理想主义所吸引的人，他们一度傲娇自信，却难免要遭受命运的锤击，而那些自以为可以避开历史跌宕的人，却可能作茧自缚，一步步走向了更荒谬可怖的人生。

因此，历史的阴面和阳面向来是不分离的，不能单从结果上的成功或失败来断定历史进程的正误，尤其在历史转折点上，很多隐微的细节都会改变最后的结论。当史学家面对历史偶然性的时候，理性思维就失



效了，因此向来不缺乏把历史推向“不可知论”或“神秘论”的人。但如果一味认为历史的生成都是“幸存者偏差”，观察历史又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不同的观察路径，得出的结论也是千差万别，但换个角度想想，定论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我们放弃定论，而是品读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会更有趣味、更有价值呢？更何况，套用一下福柯的思维，最重要的还不是历史实然如何，而是历史何以如此？

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思考起点上，追溯历史背后的思潮，可能比外在的症候更有意思。正如英国思想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关键命题，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个体情绪、精神症候尤其是思维方式，都影响着人物的命运与历史的进程。柯林武德的思想对我启发很大，而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对历史现场的情感介入，更有“心灵史”意味上的启发。

从思想史到心灵史的观察路径，或许能让那些被掩盖的历史更加生动，也更趋于真实。本书中的人物，既有历史激流中的帝王，也有风云变幻中的将相文人，还有跌宕岁月中的小人物。如果从广义上认同茨威格式的“历史同理心”，那么不论是天真的文人还是浪荡的昏君，都能被纳入同一维度的观察里。

因此，我想努力还原历史现场，去探知每个人物的命运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人在不可预知的命运面前的行为，导致历史的走向与最初的想象多数时候并不一致。在纷乱的事世面前，既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也有被环境裹挟的无所谓善恶的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其命运在时代变幻时都是不确定的。

当然，我更偏爱小人物身上光辉的色彩，以及大人物在抉择面前内



心深处的纠结，希望从失败者身上找到命运的虚妄所在，也希望在“烈火烹油”式的繁华中看出隐微的憔悴。正如茨威格所言，“那些历史的尖峰时刻都需要太长的酝酿时间，每一桩影响深远的事件都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能找到“酝酿”之下的隐藏的真实，发现“尖峰”两旁的奇诡风景，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是为序。

推荐序

## 兼顾史实与史识的写作

解玺璋

热了很久的民间写史，用力最勤最多的，大约是在“恢复历史真相”这一点上。作者和读者都很在意能否“重返历史现场”，其目的，无非是想看一看“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纠正那些一直占据我们头脑的谬说和臆断。这种心理其实不难理解，只能说明以往历史书的内容有太多值得我们怀疑的地方，期待后来者能为我们答疑解惑，揭示真相。

历史被歪曲、改写、遮蔽、误解的原因很多，非只一端。当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怀疑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真实可靠性，指责梁启超造假，只因他看到的材料尚不足以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直到孔祥吉先生发现当年刑部司员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才解决这个问题，还梁启超以清白。这是历史论述中很常见的现象，说明新的材料的发掘、发现，常常可以改写历史的面貌和结论。

此事常有，无须多言。而危害更大的，是那些为了私利刻意歪曲、改写、遮蔽、忽略历史真相的书写。长久以来，这种文字充斥于大量的



历史读物中，因此，民间历史写作者承担着很重大的一个使命，即还历史以清白。此外，还有一点也需说明的是，有时候，材料是同样的材料，但由于观点和角度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历史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写作，写作者作为历史的认识主体，自有其不可离弃的价值观，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写作者脱离这一点去侈谈所谓客观真实性。同时，基于对价值多元的尊重，我们也没有理由排斥不同观念指导下的对于历史的解读。

这些拉拉杂杂的思绪，是我读黄西蒙此书时想到的。他把书稿发给我，希望我能作一篇序言。我也是热衷于历史写作的，算是同好，自然不好拒绝。而且，翻检一下篇目，多是我感兴趣的内容，这也调动了我的积极性，索性一篇一篇看下去。全书28篇，分属三个部分，显然是刻意为之。三个部分的编排，首帝王，次将相文人，再次为小人物、无名氏，也是用了心思的，大约是想兼顾而不至于有所偏废吧。

不过，西蒙历史书写更突出的特点，是见小不见大，即小中见大，这个“大”也不是宏大叙事之“大”，而是“奇特细节”，他更关切的是历史跌宕里个人的体验。在历史大变局即将到来的时刻，“历史中间人”往往是意识不到的。也许有少数先知先觉的人敏锐地发现了某些端倪，却也无力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改变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动因常常又蕴含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偶然性中。我很认同西蒙的这种看法，它的好处是把历史研究和书写引向人，而不是仅仅面对一堆空洞的概念。罗素认为，历史是人的创造，研究历史也就是研究人性，研究人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读西蒙的书，可以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曾经被告知，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始终是按照这样的规律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的，而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找到这样的规律，人所能做的，是遵循和适应这样的规律，绝不能违背这些规



律。我不能说这样的规律有还是没有，也许是有的吧，但那规律的探寻和把握只能另委高人，绝非我辈所能胜任。在我看来，假如历史都是预先被注定了必然会发生的，那么，实际上是忽视了人对于历史的能动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性，历史离不开人，但它也不会服从于人为设定的貌似自然、客观的规律。有趣的还是那些充满了人情味的历史场景和面貌。

读西蒙的作品，感觉他是很想出新的，几乎每一篇都想纠正旧说，提出新的观点。这里可以感受到一个青年写作者的锋芒和锐气。能看出来，他读的书很多，可谓杂学旁搜，古今并蓄，虽没有秘府典籍，官私收藏，掌握的材料还是很丰富的，有些也是稀见的。因而，他立论的基础是很扎实的，绝非泛泛空谈，耽于想象和推论，也就避免了历史写作中常见的偏重材料或偏重观点的毛病。我和西蒙还有个共同点，都供职于报社，都有在报社搞评论的经历。方汉奇先生曾对我说，有新闻工作经历的人，搞历史研究有便利条件。我想他的意思是说，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能教会我们用事实说话。这里包括了两个方面：“事实”和“说话”，移植到历史研究中，或许就相当于“史实”与“史识”吧。利用得好，这便是我们的优势。西蒙的历史写作，即得益于此。

拉杂写来，勉为序言。

解玺璋 于望京二随堂

2019年5月6日

第一篇

历史激流中的帝王 / 1

殷商晚期的一桩谜案 / 2

“穿越者”王莽的悲剧根源 / 9

两个刘秀与谶纬之谜 / 18

司马懿的果子 / 26

南朝宫廷内外的奇诡事件 / 33

淝水之战与前秦梦碎 / 44

契丹皇族的大漠落日 / 54

临危受命的一日皇帝 / 62

明初帝王的奇特镜像 / 70

## 第二篇

### 风云变幻中的将相文人 / 75

伯夷叔齐的“不合时宜” / 76

吕不韦是否在扭转乾坤 / 81

赵高的密谋与血仇 / 89

燕然勒石与记忆之痕 / 98

晏殊的幸运与北宋的困境 / 105

钓鱼城下的世界战局 / 110

耶律楚材还能怎么抉择 / 117

喋血南坡与早夭的汉化改革 / 125

李善长案背后的秘密 / 134

徐霞客的山山水水 / 141

### 第三篇

#### 跌宕岁月中的小人物 / 147

一个唐朝人的非洲之旅 / 148

华县大地震里的沉默者 / 155

一朝落尽长安花 / 161

“扯淡碑”背后的世事苍茫 / 165

当末代进士遭遇明清易代 / 171

张献忠草台班子里的文武状元 / 177

一位怀才不遇的晚清乡绅的人生逆旅 / 184

蔡东藩的千秋悠思 / 190

怀旧与感伤：一个难以忘却的“梦” / 195

#### 后记 爱与挽歌 / 201

#### 主要参考文献 / 203

## 第一篇

# 历史激流中的帝王

## 殷商晚期的一桩谜案

翻开《史记》本纪篇的前三章，会发现司马迁对五帝和夏商时期历史记录相当粗略。有关多数统治者的记录，仅限于一个名字，有些有大致的在位时间，而更多的只是一笔带过，讲明何人“立”、何人“崩”，几十年的风雨跌宕，可能就被一带而过了。不难想象，司马迁能看到的上古史料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太史公的记述以严谨考究、惜字如金著称，后人从中挖掘出的蛛丝马迹，绝大多数时候都能与后世的考古结果相印证。

但殷商晚期的“武乙射天”的掌故，却是《史记》里非常奇怪的一段史料。司马迁有关武乙的记录不长：“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僂辱之。为革囊，盛血，叩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这段简单的文字起码说了三个重要的信息：其一，武乙不是个贤明的商王，而是“无道”，熟悉《史记》的读者，都会明白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太史公对这个历史人物十分厌恶，他不会用贬义色彩如此鲜明的评价，在古代，评价帝王“无道”基本就等同于说他昏庸无能、凶恶残暴。其二，武乙用所谓“射天”的方式来打击“天神”，这



种行为在中外古代史里都十分罕见，可谓离经叛道。其三，武乙的死非常蹊跷，竟然是在打猎时候被暴雷劈死的，算得上是帝王中最罕见的死法之一。

从古籍史料里看，帝王“射天”之事并非只有武乙一人做过。同样在《史记》里，《龟策列传》就记载：“桀为瓦室，纣为象郎。徵丝灼之，务以费。赋敛无度，杀戮无方。杀人六畜，以韦为囊。囊盛其血，与人县而射之，与天帝争疆……”桀纣这暴君的“射天”行为，跟武乙所为几乎一模一样，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否是对桀纣无道行为的过度夸张。至于另一个著名的“射天”之事，则是《史记·宋微子世家》里记载的宋康王的掌故：“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

但是，“武乙射天”后发生的雷击案件，让此事变得不同寻常，这难免会让古人想起天道报应之说。而且，太史公在《史记》里用了“武乙震死”这样的说法，但其他商王的死，大多被他叙述为“崩”，这与前文所说对武乙的鲜明贬义评价相契合。

翻遍《史记·殷本纪》，会发现历代商王的死几乎都被称为“崩”，即使是太甲、阳甲这样有争议的商王（比如在其统治时期发生了“殷衰”之事），也没有被刻薄地说成“死”。当然，商纣王的结局被叙述为“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这并无意外之处，只是把武乙和纣王放在一个评价等级上，还是让人觉得十分蹊跷。

在现存的史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武乙是个荒淫昏庸的商王。相反，武乙挑战“天神”，比那些在《史记》上只留下一个名字的商王，做了更多打破常规的事情。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殷商晚期王权与神权斗争激烈，“武乙射天”这种近乎荒诞的行为是为了挑战对王权构成威胁